



猕猴数量超载,保护背后有新烦恼

在蒙育宁的印象里,猕猴数量增多从2004年他来到位于扶绥县的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岫盆片区工作时就显出了端倪。

此前,一个猕猴种群大概在几十只左右。但岫盆管理站连续监测发现,有些猕猴群体一段时间内增长了10余只不等,整个猴群接近上百只。最近一次统计显示,岫盆片区猕猴数量已有1000多只。

目前,岫盆自然保护区内已确认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35种,其中包括云豹、林麝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种;大灵猫、蛇雕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0种。

白头叶猴作为旗舰保护物种,保护工作辐射整个片区。过去,老百姓的猎捕活动是导致白头叶猴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自治区政府协同保护区通过改善当地人居环境、修复野生动物栖息地、开展科普宣传等方式,增强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猕猴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自然也纳入保护区范围内。当地百姓不再捕杀白头叶猴,对猕猴也一视同仁,对于受伤的猴子还会主动送往岫盆管理站进行救治。

猕猴作为杂食性动物,繁衍生存能力较强,随着生态环境逐年向好,猕猴种群数量增长越发明显。然而,这给白头叶猴的生存带来一定程度威胁。由于两种猴类都喜欢在山坡、山脚等地带活动、觅食,一旦相遇,一个正常繁殖群的白头叶猴数量远比一个正常繁殖群猕猴数量少,因此,白头叶猴处于弱势群体,猕猴抢占白头叶猴生存空间,导致其生存领地受到压缩。

猕猴数量增多,不仅对白头叶猴生存产生影响,也给当地百姓带来苦恼。作为岫盆管理站站长和扶绥县村民,蒙育宁深有体会:“以前猕猴数量相对少,即便它们下山来吃些农作物,损失不大,大家也都十分宽容。现在猴子数量已达到上千只,导致区域周边3500公顷的耕地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作为“中国糖都”,甘蔗是崇左市的主要经济作物,而这里盛产的甘蔗、木薯、花生、南瓜等经济作物,恰好都是猕猴喜爱吃的。

“这些猴子一天会到地里吃上好几餐,我们看到只能驱赶。不过它们很聪明,等我们走了会回来接着吃。”扶绥县岫盆乡弄康村村民告诉记者,有时一天能因此损失上千元。“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在地里盯着,看着辛辛苦苦种下的瓜果被猕猴糟蹋一空,真的挺无奈。”

“村民们身体力行保护了野生动物,但他们遭受的损失又该怎么弥补?”这是蒙育宁这些年一直思考的问题。

“遇到农户受损,我们会耐心劝导,但我们心里也不好受。”蒙育宁说道。

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龙泉街禁捕工作站,工作人员正向记者展示着禁捕站的智慧监测平台。在电子屏幕上,记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湖中心沙洲上一群停留的大雁。“现在,禁捕队员不用再长时间巡逻、蹲守,有这个智慧监测平台当我们的“眼睛”,很多工作轻松多了。”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博说道。

除智慧监测平台的运用,龙泉街道禁捕工作还引入了河湖长制“工作站+N”的工作模式,让禁捕工作更加规范与完善。

从“跑不赢”到违法行为秒发现

“我们的手机都安装了一个软件,与智慧监测平台连通,只要有人踏进监控范围,这个系统就会发出警报,告知我们有可疑人员出现。”李博介绍道。

在东湖高新区的牛山湖,湖岸沿线布设有高空监控摄像头,与工作站智慧平台对接,形成了湖泊、湖岸线全天候、全方位、无死角监控。龙泉街禁捕工作站主要管辖牛山湖,它作为武汉市梁子湖的子湖,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因此也成了附近渔民赖以生存的“粮仓”。

2021年长江实行“十年禁捕”政策后,牛山湖作为水源与生态保护区被要求严格实行全面禁捕,依靠牛山湖而生的渔民们响应政策纷纷上岸。

但禁捕工作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仍

护野生动物,白头叶猴曾濒临灭绝。如今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白头叶猴已从过去的300多只增长到1400多只。

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部分区域猕猴数量剧增,也带来了新的难题。“猕猴数量太多了,经常下山采食村民庄稼,造成村民经济损失,给我们的保护工作出了新难题。”蒙育宁说。

猕猴数量超载引发农户受损

崇左如何续写和谐“人猴关系”?

◆本报见习记者李翔宇

多方探索,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待出台

实际上,针对猕猴数量过多、百姓农作物受损的问题,崇左市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多个部门都采取过不同措施。

“以前我们曾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申请捕捉猕猴指标,以便把猕猴数量和致害事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岫盆管理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项工作需要经过科研院所及高校专家对种群数量进行论证,确定合理方案后,再组织专业人士上山捕捉,最后将这些猴子送到具备资质的场所用于种群繁育等科学研究。

虽然捕捉猕猴行动持续开展了几次,但也付出了高额的资金成本,加上当时猴子的数量尚在保护区能够容纳的范围内,且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趋严,这项工作并未常态化。在工作人员印象里,距离上一次捕捉行动已过去了十几年。

“村民们在农作物受损后都会向岫盆管理站反馈,我们一般会协同政府部门进行现场勘察,记录受损情况,安抚村民情绪。但管理站并没有理赔能力,我们通常会建议村民将情况向县政府反映。”蒙育宁说。

在村民理赔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以下简称广西林业局)也进行过初步尝试。广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处处长张振球介绍,自2022年起,崇左市部分县纳入野生动物致害的政策性保险,对个别受损村户进行了补偿。

“这项保险目前覆盖范围较小,补偿金额较少,难以满足崇左市乃至自治区的实际需求。对此,依据新出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们已经撰写《广西壮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目前正在走有关程序。”张振球说。

据了解,广西林业局在综合考虑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针对野猪、猕猴等动物致害村屯农作物的情况,协同各市、县林业部门及保护区开展了多次深入调研。撰写的《办法》将针对自治区实际情况,明确补偿主体、范围、标准、流程、措施等内容,解决百姓农作物受损、野生动物伤人等情况的补偿问题。

目前《办法》已完成了公众意见征求,待政府部门反馈意见并通过合法性审查后出台。“这些年百姓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作出很大贡献,为促进百姓与野生动物尤其是与猕猴的和谐共处,对于它们造成的损失,我们也在努力完善政策制度,以保障百姓利益。”张振球说。

续写和谐“人猴关系”,科学调控是关键

《办法》的制定无疑为崇左市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展注入了新希望。

“作为崇左市百姓,我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爱着这群生活在大山中的精灵。”蒙育宁与猴

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岫盆片区。岫盆管理站供图

群朝夕相处二十年,熟悉它们的习性、知道它们的喜好、了解它们的行踪,他认为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构建起了一座人猴相处的桥梁,看到《办法》得以推进并有望出台,管理站工作人员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蒙育宁也表示,保护野生动物并维护好百姓的利益,不能仅靠《办法》。一个猕猴种群多达上百只,保护区内共有十几个猕猴种群,它们每日三餐造成的农作物损失,仅靠补偿会给当地财政造成较大压力。“当下的重点工作,应放在科学调控猕猴种群数量上,在完成有关调查监测的前提下适度捕捉,使猕猴数量维持在合理范围内。”

有专家对猴子等野生动物致害案件也提过相关建议。如针对部分地区猕猴数量过多问题,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研究员冉景臣建议,一方面,公众要尊重猕猴,和它保持安全距离不去干扰,并禁止投喂;另一方面,主管部门要控制猕猴种群增长速度,对现有猴群进行分流与种群调控,减少猴群对人和环境的伤害。

针对制定猴群分流工作方案,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灵长类专家组成员周江认为,需要考虑麻醉方式、分流维度及如何面对公众舆论等细节问题。

对于种群调控的必要性,张振球表示肯定。他介绍,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对种群调控猎捕的野生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和综合利用。

从国家层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印发《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保护区猴群调控及致害赔偿工作也提供了明确指引。《方案》提出,要分级分类开展野生动物种群调控,将其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防止出现个别物种过快增长状况。同时,要探索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赔偿机制,解决补偿问题,并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制度。

此外,在野生动物致害严重区域,《方案》指出除依法予以补偿外,还可以积极引导群众调整农业结构或发展其他产业,支持对受损频繁的住户进行移民安置。

张振球表示,下一步,广西林业局也会加紧开展猕猴等致害严重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相关工作。不仅如此,为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需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保障野生动物获取足够的生存空间和食物来源,林业部门将协同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等相关部门做好执法工作,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同时,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增强当地百姓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禁捕工作站有了警长检察长

武汉龙泉街道完善河湖长制提升禁捕实效

◆本报见习记者杨沐

有大部分人选择铤而走险,下网捕鱼。“刚开始做禁捕工作的时候,天天跑不赢,好不容易追上偷捕者将他劝走了,一转身他又回来了。”东湖高新区龙泉街禁捕队长卢忠良告诉记者,刚开始开展禁捕工作的时候,违规钓鱼的人非常多,每年会有上千起偷钓案件。后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违规捕鱼行为得到了有效管控。

“但个人垂钓的行为具有隐蔽性,违法成本较低,因此时常发生,难以仅靠人力管控。”卢忠良说道。

为消除偷捕乱象,龙泉街禁捕工作站投入50多万元,除配备智慧监测系统外,还配备了无人机、执法记录仪等装备,实现水域内全方位多点联动监测。

据李博介绍,智慧监测系统的摄像头覆盖半径达3千米到5千米区域,还有红外热成像及自动监测报警功能。如今,在新技术的支持下,禁捕队员大部分时间只需在禁捕站待命,发

现情况再出动去现场察看,极大降低了禁捕队员工作强度,同时也让违法行为无处可藏。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制度走向完善

禁捕工作在技术的支持下快速开展,禁捕队的工作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与探索之中,而这源于先前禁捕队员在日常工作中常遇到的各种“力不从心”的问题。

“比如,以前我们常遇到有人不服我们没收他的钓具要告我们,或者抓到偷捕违法人员不知如何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统一标准,导致我们难以规范处理这些事项。”李博补充道:“实际上,我认为这项工作涉及职能权限不同的问题,禁捕队起到提供线索的作用,其他执法工作等事项还需交给专职人员做。”

为解决这一问题,龙泉街道禁捕工作引入了河湖长制“工作站+N”的工作模式,工作站分

大江奔腾,碧水东流。南京城,是万里长江进入江苏省的站点,拥有6288.7平方千米的长江流域面积和280千米的长江岸线。今年,我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满三周年。近年来,南京市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伴随着长江的涛声,人们从碧波浩渺、生生不息的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一路东去,到三江河口处望澄江如练,看南京如何书写长江大保护的时代答卷。

还江于民,长江生态岸线绿意正浓

龙年春节,牛首山风景区成为南京接待游客最多的景区之一。经过生态修复,只见长江沿岸过去的废矿洞重新“长”出了层层叠叠的翠绿“皮肤”。登山远眺,长江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绿意葱茏的岸线上几步一景,几乎每个景观背后都藏着一个生态“蝶变”的故事。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沿岸城市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从曾经码头聚集、塔吊林立、“临江不见江”,到如今水清岸绿、各美其美、“江作青罗带”,近年来,南京市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铁腕治污,统筹治岸。着力推动“生态进、生产退、治理进、污染退,高端进、低端退”,全力破解“化工围江”难题。

2018年至2023年,南京市拆除取缔160个项目,整改规范66个项目,累计清退生产岸线37.6公里。长江生态岸线比例从2018年的66.2%增至目前的80.26%。

为让长江更清、生态环境更好,南京市还结合实际制定了系列地方性法规和制度,强化法规配套。2023年1月1日起,《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南京长江保护的“法治护甲”更坚实。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污染长江流域环境、破坏长江流域生态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条例》进一步明确岸线清理和环境综合整治相结合,推进已退出岸线的复原、复绿及滨江岸带的生态修复,助推沿江板块高标准打造生态特色示范工程。

目前,南京市已形成鱼嘴湿地公园(原清江油库)、三山矶公园(原雨花台梅岗9号路片区)、春江十里景观带(原浦口“十里造船带”)等一批标志性生态修复案例。其中,“南京滨江明珠——幕燕滨江生态修复”和“国家级地质公园——南京方山火山地貌生态保护修复”两个项目还入选江苏省“最美生态保护修复案例”。

如今,两岸贯通滨江绿道达72公里,沿江绿色廊道已全面联网成片,长江岸线绿色肌理已深深植入南京的“城市基因”,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生态景观。

与江共生,长江水生生态生机勃勃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工作,自2021年1月1日起全面启动,随后对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也被写入我国《长江保护法》中。

为更好了解《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南京市长江江豚种群变化趋势和活动范围,3年来,南京市持续组织开展长江江豚同步调查活动。2023年11月的调查结果显示,长江南京段江豚居长江江豚数量已达到62头,比5年前增长了24%。南京市江心洲、新济洲、鱼嘴湿地公园等点位均出现长江江豚活动的身影,其中,三山矶、五马渡等新增设点位历年来在同步观测中均发现江豚记录,且五马渡是唯一设立在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点位。

“这说明长江江豚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生态环境的质量改善让它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长江南京段畅游。”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姜盟说。

位于鼓楼滨江岸线的“长江微笑驿站”是南京13个观测点位中看到长江江豚频率最高的点位,创下一天内看到长江江豚72次的记录。“微笑精灵”频频现身开心戏水,也折射出南京市“长江禁渔”工作的深入推进。

去年,南京市制定了《2023年长江禁渔工作计划》,明确重点工作任务,先后组织开展春季护鱼、百日攻坚、夏秋季执法等专项行动。全市开展多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750余次,破获涉渔刑事案件200起,办理涉渔行政案件794起。

同时,不断优化禁捕水域管理,夯实“市、区、镇街、社区(村居)”四级网格监管体系,持续开展渔政协助巡护,推进智慧渔政信息系统建设,充分运用无人机、高清监控等科技手段,不断完善专打与联打、人防与技防、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实现“水陆空网”高效联动,切实维护好禁捕水域管理秩序。

随着长江水生态的恢复,许多珍稀鸟类,如东方白鹳、白琵鹭也从“稀客”变为“常客”,长江江豚的朋友越来越多。

共护共治,大保护理念浸润人心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指引下,只有做到“共护”“共治”才能实现“共赢”。去年11月,长江文化南京论坛在扬子江国际

还江于民 与江共生 拥江发展

南京书写长江大保护时代答卷

◆赵彤 褚方樵 张健

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论坛以“河流汇聚可持续未来”为主题,围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商河流文化、生态、经济、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共论大河可持续发展之道。

对保护长江的讨论不仅仅局限在会议中,也正发生在南京市中小学生的课堂里。长江大保护已连续两年成为南京市“生态文明第一课”的主要内容。“爱江、护江、拥江”的生态文明理念正深深植于孩子们的内心。

2019年6月5日,江苏省沿江8市启动了“长江大保护绿色共成长”活动,选拔一批具有环保理念的小朋友作为“长江大保护小使者”,并计划连续12年通过他们采集记录长江沿岸的空气、水、土壤样本,观测生物多样性等方式,记录长江生态变化。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六年级学生曾婧对自己“长江小使者”的身份非常骄傲:“我希望可以把长江大保护理念践行到日常生活中,带动家人和同学们关注并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让长江风景越来越美。”

一年又一年,孩子们手中采集到的江水、空气、土壤样本见证长江沿岸的变化。截至2023年,长江南京段总体水环境质量保持优良,42个国家考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100%,连续5年保持全省第一,28条主要入江支流水质全部达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100%。这几个100%的背后,是对长江南京段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攻坚治理的最好佐证。

大江奔流,生生不息。市民们在移步换景间,能望得见江河,触得到绿色,品得到历史,享得到文化。南京正以还江于民、与江共生、拥江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长江大保护的时代答卷。

而是动员了更多社会群体参与其中。在“工作站+N”的制度体系下,禁捕站吸纳了社会志愿力量助力禁捕工作。如在湖中心,武汉市晴川学院的竹蜻蜓飞行协会利用无人机帮助禁捕队进行巡湖作业;在岸边,民间河湖长带队巡查湖岸线,进行水质监测、垃圾清理……人们渐渐主动参与到保护牛山湖的队伍中。

龙泉街道禁捕站的20名队员都是由渔民转业为禁捕队员的,他们能理解捕鱼人的行为动机,所以在日常工作中,会主动去说服与劝解。他们希望以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慢慢让群众感受到禁捕工作的重要性。

长期的努力付出换来了可喜变化。“现在,我们巡湖不管去哪儿,基本上湖边都看不到垃圾,偷捕也少了很多,一年可能只有几例,这与平日里做的大量宣传工作有很大关系。”卢忠良骄傲地说道。

以前,牛山湖因无序养殖、过度捕捞等原因,水质越来越浑浊。2016年调查显示,牛山湖水质下降明显,水草覆盖率已不足三成。如今,在牛山湖的沙洲上,总有一群迁徙候鸟飞来过冬,没有船只和人为因素的干扰,江豚也前来觅食。滨湖街牛山湖畔也发现“鸟中大熊猫”青头潜鸭的繁殖证据。同时,代表水质良好的“水下森林”也已重现,十六七种水草覆盖湖面,水草覆盖率达70%以上。

“如果禁捕工作能一直做下去,那我很愿意做到退休,看着牛山湖的环境越来越好。”卢忠良说道。

从不被理解到获得认可,见证生态好转

现在,禁捕工作已不再局限于禁捕队自身,